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越南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演变

杨丹¹ 黄刚²

(广西民族大学)

摘要:

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系统梳理 1975 年以来越南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将其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体制(1975-1986 年)、革新开放初期的金融转型(1986-2000 年)、金融自由化与国际接轨阶段(2001-2020 年)和后疫情时代的金融深化与可持续发展(2020 年至今)等四个阶段。分析研究发现:政治体制与政策取向、经济发展模式、文化认知结构等因素共同构成影响越南金融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机制共同塑造了金融制度由高度集中走向开放多元的演进逻辑。本文不仅拓展了历史制度主义在金融制度变迁研究中的理论外延,也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的改革路径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经验样本。

关键词: 越南金融制度; 历史制度主义; 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

1. 问题的提出

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金融体系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市场规模显著扩大。然而,当前金融制度在应对结构性风险、监管能力提升及金融创新等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与全球竞争格局重构背景下,这些问题对越南金融稳定与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深层威胁。

学术界对越南金融制度的研究多聚焦单一制度和特定领域,缺乏对金融制度演变历程及其逻辑的历史审视。本文基于 Klaus Nielsen 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1]入手,系统梳理越南金融制度变迁,剖析其演进逻辑,以揭示其变迁特征、动因及主体作用,为越南金融制度未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其他国家金融改革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2.1. 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

Kathleen Thelen (1992) 等人在学术意义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强调过去的制度对于新制度的持续影响,体现了制度之间的“路径依赖”(赵越等, 2024),即过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会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过程(张霞等, 2024)。关键节点指的是制度发展中遇到会使其原有的均衡便被打破从而导致制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事件(郭丽君等, 2023);同时,它兼顾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制度主义各自方法论的优点,提出具有中观层面特征的方法论(杨光斌等, 2011),即在分析过程中,构建“中观型”理论体系,形成“宏观结构(宏观背景)—中观制度(路径依赖)—微观行动者(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周光礼等, 2009),能够做到对宏观与微观层

¹ 杨丹, 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金融, 邮箱: 2870083093@qq.com;

² 黄刚,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金融、东盟研究, 邮箱: 837322699@qq.com;
基金项目: 2024 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课题: 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研究(24GJF002)

面的有效衔接（郭哲等，2020）。在上述概念影响下，历史制度主义发展出两种分析范式来对制度变迁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即结构观分析范式与历史观分析范式（如图 1）。本文先梳理越南金融制度发展历程，明晰其历史演变。随后运用历史主义制度的两种分析范式，挖掘其深层次的结构和历史演进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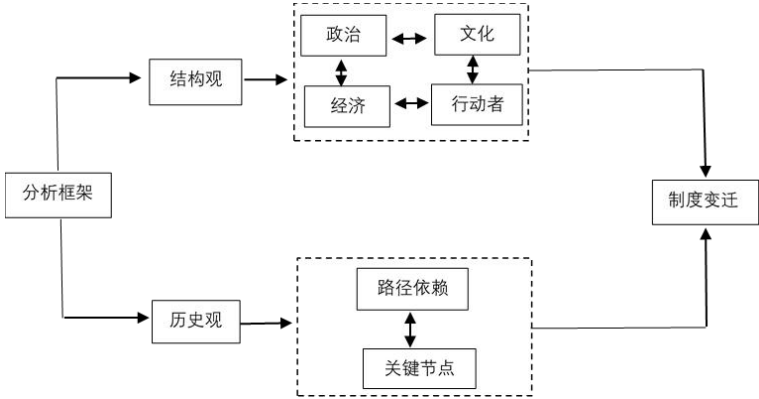


图 1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2. 2. 历史制度主义与越南金融发展历程变迁分析的适切性

从历史事件和决策中探寻越南金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识到越南金融制度的发展是历史过程的产物。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朱庆环等，2009）框架梳理越南金融制度变迁，能从不同层面深入剖析，揭示内在逻辑，具有较高理论适切性：（1）中观制度分析是建立深层结构与微观行动者的桥梁，透彻阐明了越南金融发展变迁的具体运作模式（2）宏观结构分析助力我们理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对越南金融发展目标和制度安排的深刻塑造（3）微观行动者逻辑分析揭示了金融市场中，国有银行、金融科技企业等各类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创新活动，如何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直接驱动力。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越南金融发展历程的因素进行梳理。

3. 变迁历程：越南金融制度发展历程的演变

通过对越南金融发展的时间序列和关键节点进行剖析，将发展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有其独特的发展特征。

3. 1. 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体制（1975-1986 年）：高度集中与封闭运行

3. 1. 1. 宏观结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同塑造

冷战格局下，越南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一方面遭受西方经济封锁，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苏联援助。在此背景下，政府将“国家安全”与“重工业优先”确立为核心战略目标，金融体系被赋予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政治上，国家对经济实施全面计划管控，金融体系纳入计划经济框架，国有银行垄断资源配置。越南国家银行作为唯一央行，承担货币发行、信贷管理与外汇调控职能，金融资源主要投向重工业和农业。经济上，国有银行执行指令性信贷，服务国营与集体经济。金融市场几近空白，缺乏证券与债券，融资渠道单一，外汇管理集中，外贸金融完全依赖国有体系。社会文化层面，越南战争记忆与社会主义体制强化了集体主义与国家认同，民众普遍信

任国家主导的经济与金融安排。社会资本与市场机制难以独立成长，进一步固化了金融体系的集中化与封闭性。

3.1.2. 中层制度：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

在这一时期，越南金融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制度以国家意志为核心，其初始设计不仅规定了资源配置方向，还通过自我强化机制不断固化。国有银行作为金融资源的唯一主渠道，严格执行指令性信贷计划，市场机制几乎无从发挥。由此，早期制度选择为金融体系设定了集中与封闭的发展轨道，并在惯性驱动下长期延续，深刻影响了此后金融制度的运行逻辑。

3.1.3. 微观行动者：缺乏活力的利益格局

这一时期，金融体系的微观行动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依据国家计划分配金融资源，缺乏自主决策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国有企业则过度依赖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对市场信号反应迟钝。各微观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围绕国家计划构建，缺乏市场竞争和利益博弈，导致金融体系活力不足、效率低下。

3.2. 革新开放初期的金融转型（1986–2000 年）：市场化探索与初步开放

3.2.1. 宏观结构：内外环境变化催生改革需求

冷战进入尾声之际，苏联因经济停滞逐步削减对越南的援助，致使越南长期依赖的“军事扩张”战略失去资金与外部支撑，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1986 年召开的越共六大不得不将国家发展重心由军事转向经济，以稳定政局并奠定改革基础。这一战略转折为金融领域的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资本流动与贸易自由化成为主要驱动力，越南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亟待变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亦对越南产生了直接示范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改革的紧迫感。由此，越南提出“革新开放”政策。在制度安排上，1988 年国家银行剥离商业职能，设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990 年《银行法》和《国家银行法》颁布，确立了双层银行体系。随后，1990 年《私人企业法》与《公司法》通过，为私营经济和股份制企业提供法律依据。1992 年新宪法正式承认私人经济地位。1993 年起，越南在 IMF 与世界银行支持下推行结构调整贷款，推动利率市场化、取消信贷配给、建立外汇拍卖市场，标志着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展开。

3.2.2. 中层制度：关键节点打破旧均衡与制度置换并存

“革新开放”政策成为这一阶段的关键节点，打破了原有金融制度的均衡格局。越南国家银行开始从全能型央行向现代央行转型，货币政策逐步走向市场化。1987 年《外国投资法》出台，外资获准进入，国有银行逐渐商业化，私营银行相继设立，金融体系迈向多元化。此阶段改革既延续了国有银行主导的路径依赖，又在引入新制度元素的过程中实现了“边缘创新”。

3.2.3. 微观行动者：新力量推动市场竞争与创新

随着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新的微观行动者如外资银行和私营银行开始涌现。这些新力量为了在市场中获取利益，积极推动金融创新 and 市场竞争。国有企业也在市场环境的压力下，逐渐

适应市场规则，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各微观行动者之间的利益角逐加剧，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

3.3 金融自由化与国际接轨阶段（2001–2020 年）：加速开放与结构转型

3.3.1. 宏观结构：全球化与国际规则的深刻影响

进入 21 世纪，越南逐步确立“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战略。2007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其金融体系全面纳入全球规则，既提供了扩张契机，也带来制度改革压力。作为东盟成员国，越南需履行《东盟金融一体化蓝图》承诺，在跨境结算、银行牌照和资本管理等方面逐步接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虽冲击出口导向型经济，却促使越南于 2009 年设立国家金融监督委员会，强化宏观审慎监管。

在经济层面，银行体系改革成为核心任务。此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本不足与不良贷款率高的问题。“入世”后，越南允许外资设立独资银行，推动竞争。2009 年中国工商银行在越开设首家分行，2010 年《信贷机构法》进一步明确外资银行分行的法律框架，带动新一轮外资进入。2016 年后，区域性银行加快布局。资本市场方面，2019 年政府重组两大证券交易中心，成立越南证券交易所，股票与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融资渠道趋于多元。

3.3.2. 中层制度：渐进式断裂与创新驱动变革

这一阶段，越南金融体系呈现出“渐进式断裂”的特征。计划经济遗留的体制虽未彻底消解，但在制度置换与机制创新的推动下，金融体系逐步走向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WTO 规则与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构成关键节点，迫使越南强化监管与风险防控，并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同时，金融科技兴起成为新的驱动力，国家银行逐步完善相关监管框架，加快数字金融探索与金融体系现代化进程。

3.3.3. 微观行动者：科技企业引领创新潮流

居民收入提高与中产阶级壮大推动了零售金融的迅速扩张，信用卡、住房按揭和消费分期等业务在城市广泛普及。与此同时，Momo、ZaloPay 等金融科技企业快速崛起，为金融体系注入新活力。它们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满足多样化需求，并与传统银行在竞争与合作中共生发展，共同推动市场变革与制度创新。金融科技的崛起由此成为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征。

3.4 后疫情时代的金融深化与可持续发展（2020 年至今）：数字化转型与绿色金融

3.4.1. 宏观结构：疫情冲击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与机遇

2020 年新冠疫情对越南经济造成短期冲击，尤以出口制造与旅游业受创最深，同时也暴露出传统金融在远程交易、线上支付和风险评估上的局限，推动政府加快数字化转型。全球气候治理共识强化之际，越南在 2021 年 COP26 上承诺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直接催生绿色金融政策。政府与央行随即出台绿色信贷指引和绿色债券标准，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金融体系。

数字化转型覆盖银行、资本市场与支付环节。国家银行升级跨行即时支付系统，引入开放银行理念，推动银企合作与 API 服务。移动银行、二维码支付和非接触式交易迅速普及，资本市场则通过电子交易和远程开户提升了投资者参与度。

3.4.2. 中层制度：制度微调与断裂并存的动态调整

这一时期，越南金融制度的变迁动力呈现“微调”与“断裂”并存的特征。一方面，监管体系在既有框架内不断优化，如强化金融科技监管、完善绿色金融工具，以回应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疫情、供应链重组与地缘冲突等外部冲击，则迫使金融体系进行断裂式改革，包括推进跨境支付建设、加大金融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体系韧性。

3.4.3. 微观行动者：数字化与绿色化的积极践行者

在微观层面，数字化金融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地域限制，惠及农村与岛屿居民。通过手机银行和电子钱包，农户能够直接获取贷款、保险和结算服务，改善生产与生活条件。金融科技企业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出在线小额信贷、智能投顾和保险即服务等产品，提升了用户体验与覆盖面。

同时，绿色消费理念在年轻群体中逐渐兴起，低碳出行、绿色能源消费与碳足迹计算等金融化服务不断涌现。部分银行还推出与碳减排挂钩的信用卡积分计划，激励公众参与环保。数字化与绿色金融的结合，不仅提升了金融体系效率，也强化了各类行动者的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越南金融体系迈向数字化和绿色化。

4. 深层结构：越南金融制度变迁的结构逻辑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越南金融制度的变迁并非单一维度的结果，而是国家权力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利益格局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其深层逻辑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揭示。

4.1. 宏观层面：国家主导与市场嵌入的双重逻辑

在宏观层面，国家政权与发展战略始终是越南金融制度变迁的根本驱动力。1975 年统一后，越南确立了以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体系被定位为国家财政的附属工具，主要服务于工业化战略和资源再分配。这一阶段的制度逻辑体现为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与资源配置，其合法性来源于国家主导型发展理念。进入 1986 年“革新开放”后，1986 年“革新开放”后，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既推动股份制银行、外资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引入，又保留对关键金融资源与监管权力的控制。这种“国家主导—市场嵌入”的张力，成为制度演进的宏观结构特征。

4.2. 中观层面：组织结构与政策安排的制度化路径

在中观层面，金融组织与政策工具构成了制度演进的核心中介。改革前，越南金融体系高度单一，国家银行兼具央行与商业行职能，缺乏独立市场与中介机构。改革后，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市场与保险体系逐步建立，组织结构走向多元化与专业化。政策上，政府由指令性信贷和行政调控，逐步过渡到市场化利率与汇率机制，并引入监管法规以维护秩序。这一制度化进程既回应了 WTO 规则等外部压力，也反映了国内金融风险管理的需求。然而，政策执行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使市场机制与政策导向并存，形成典型的“混合性”结构，成为越南金融制度长期演进的重要特征。

4.3. 微观层面：社会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渐进式转变

在微观层面，公众、企业与金融主体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文化基础。改革前

金融被视为国家的“公共资源”，个人与企业主要依赖国家分配。改革后，随着市场化与国际化推进，公众逐渐将金融理解为“服务型资源配置”，对效率、多元与透明度的要求明显增强。民营与外资机构的进入，以及居民储蓄和投资习惯的转变，为金融制度赋予新的社会合法性。这一观念转变是国家主导认知与市场理性逐步融合的结果，体现出制度惯性与文化适应的互动。

因此，越南金融制度的深层结构并非单纯的市场化转型，而是在国家战略导向、组织制度化与社会观念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国家控制—市场机制—社会认知”相互支撑的复杂结构。这一逻辑既揭示了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反映了制度演进中的内在张力与未来挑战。

5. 变迁模式：越南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制度变迁通常体现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由制度惯性与自我强化机制推动的路径依赖与渐进性变迁；二是由重大事件或外部冲击触发的关键节点与断裂性变迁。越南金融制度的演进过程是这两种模式交替作用的结果，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并存的历史逻辑。

5.1. 路径依赖与渐进性变迁

路径依赖强调制度一旦确立，规则与权力结构会通过自我强化而固化，形成发展的“锁定效应”。在 1975-1986 年的集中型金融体制下，行政监管、国有银行垄断等逐渐制度化，并在“革新开放”后继续影响制度演进。即便 1990 年代商业银行体系初步建立，国有银行仍占据信贷主导，行政干预依旧存在。

越南的金融转型更多体现为渐进而非断裂。1986 年改革并未否定原有制度基础，而是采取“增量改革”，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多层次机构体系，并完善法律与监管框架。1990 年《银行法》实现央行与商业银行职能分离，但真正的商业化与市场化风险管理直至 2000 年才逐步落地。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既降低了制度冲击的不确定性，也展现了制度惯性与协同效应的互动。

5.2. 关键节点与断裂性变迁

关键节点是由重大事件触发的制度转折点，往往改变既有的路径依赖轨迹。越南金融制度演进中出现了多个断裂性节点。其一，1986 年越共六大提出“革新开放”，不仅重塑宏观经济运行逻辑，也开启了金融制度由计划向市场化转型，确立了“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框架。其二，2007 年加入世贸组织，越南承诺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外资准入，并采纳国际监管标准，加速了体系的国际化与法治化，推动外资深度参与。其三，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政府与央行出台数字支付、远程开户、绿色信贷等措施，显著加快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体系在技术与可持续方向的重构。

总体而言，越南金融制度展现出“渐进—断裂”交替的演化逻辑：在长期路径依赖下以增量调整维持稳定，而关键节点则通过外部冲击或政策选择实现快速重构。这种逻辑构成理解其发展模式的核心。

6. 结论与启示

越南金融制度的演进深受政治体制与政策、经济环境、文化观念及行动者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历史轨迹体现出路径依赖与渐进改革、关键节点与断裂变迁交织的逻辑。展望未来，越南应抓住制度演进的关键节点，推动金融治理由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共治，并加快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转型，以构建更加包容、稳定与可持续的现代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3。
- 赵越，延晋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01):24-30。
- 张霞，海存福。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北欧儿童教育福利政策的变迁研究，外国教育研究，2024,51(12):30-47。
- 郭丽君，周建力。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逻辑演进，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41(08):42-48.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3.08.006，
- 杨光斌，高卫民。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02):142-148，
- 周光礼，吴越。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六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62-75。
- 郭哲，曹静。中国农地制度变迁 70 年：历程与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湖湘论坛，2020, 33(02):116-128。
- 朱庆环，杜文平。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学区制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制度逻辑.教育科学研究，2024,(06):36-42。
- Steinmo, S., Thelen, K., & Longstrech, F.,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Evolution of Vietnam's Financi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Yang Dan Huang G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Vietnam's financial system since 1975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Four stages are identified: the centrally planned regime (1975–1986), the init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Đổi Mới (1986–2000),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 integration (2001–2020), and post-pandemic deepening with a focus on sustainability (2020–present).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ultural frameworks, and institutional actors jointly shaped the trajectory, while critical junctures and path dependence directed its shift from centralization to openness. The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financial system change, offering comparative insights for reform in other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words: Vietnam; financial syste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ath dependence; institutional change.